

“知性”相通：敦煌与佛教的中国化

刘再聪

敦煌建郡始于汉武帝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及1000多尊佛造像。从乐僂以来,大规模的造窟历经北朝、隋唐,直到西夏和元朝,持续1000年。藏经洞发现的近6万件文书,记年最早是西凉,最晚到宋初,延续近800年。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是了解今天敦煌博大辉煌文化的三大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佛教中国化全面而且系列完整的重要资料。

1.佛尊像汉化、菩萨像女性化、道家神仙入洞窟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1)佛尊像汉化。佛尊像是石窟的中心,中国境内最早的佛尊像出现在新疆。汉唐时期,新疆属于西域文化系统。克孜尔石窟中的佛尊像高鼻深目,有明显的印度人特征。和田出土的泥塑佛像有“湿衣透体”式的印度韵律感。汉唐时期,敦煌则完全属于汉文化系统。但在莫高窟第268、272、275等早期洞窟中,佛尊像也是“高鼻深目”,西域特征也很明显。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人物面相依然鼻梁高隆直通额际,袈裟衣纹密集,有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孝文帝改革后,源于南朝“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中原风格才在敦煌佛造像特征上有所表现。唐代,敦煌佛相面庞逐渐汉化,出现了鼻低面庞耳大的“福相”,近似于当时人的形象,体现了唐时以丰肥为美的崇尚风格。至此,敦煌佛尊像完全中国化。不仅如此,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僧人刘萨诃在唐代敦煌被神化为与释迦牟尼佛齐肩的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莫高窟的南大像被认为是武则天形象的再现。

(2)菩萨的女性化。根据佛经记载,菩萨是“善男子”,“善男子”形象在敦煌石窟群中也有体现。莫高窟第45窟(初唐)南壁、榆林窟第25窟(中唐)的观音菩萨着装显女装之华丽,但却蓄有胡须。唐中期以后,菩萨面目丰腴,着贵妇时装,尽显“浓丽丰肥”之时代特征和世俗化风格。这种风格被描述为“菩萨如宫娃”,意味着菩萨形象女性身

份的确定。

道家神仙入洞窟。建于西魏的第249窟窟顶西披描绘印度战神阿修罗王,左右两侧描绘雷公、辟电、风伯、雨师以及乌获、朱雀等,窟顶北、南披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另外,同时期的第285窟窟顶东披绘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远古神话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灵。伏羲、女娲在汉代石刻中已出现,是中国的人文始祖。敦煌石窟中出现中国本土传统神话中的各种图像,是佛的“禅境”与道家的“仙境”相互融合的反应,是佛教美术,更是佛教思想艺术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还出现了中国的龙的形象,而一些天王力士的形象则完全是一副唐代武将的派头。

2.“疑伪经”及变文的出现与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1)中国人创作的佛经出现。佛经是佛祖的圣训,但佛经传入中国后,却出现了大量印度佛经中不曾见到的经文。这些经文由中国人创作,被称为“疑伪经”。在敦煌文书中,保留的“疑伪经”多达70余种。中国古代佛教能够在民间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疑伪经”的传播。“疑伪经”是中国佛教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发现的“疑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还被翻译成粟特文,“返销”外国。

(2)儒家思想进入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为了取得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僧人主动改造佛教学说。敦煌出土的《父母恩重经》多达114件,就是佛教自觉吸纳儒家思想的最好说明。创作《父母恩重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沟通儒、释,弥补原始佛教中“孝道”思想的缺失,是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见证。

(3)俗讲等中国式讲经方式的出现。唐代,举办法会在社会各阶层十分流行,有些佛教礼仪是印度佛教或西域佛教所没有的,其中中唐以后出现的专为俗人讲经的活动——“俗讲”最为典型。

俗讲即“对俗讲经”,方式以说唱为主,所用的底本就是变文。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变文,名称有“讲经文”“变文”“变”“缘起”“押座文”“话”“词文”“赋”等,大多为唐人写本。“变文”是中国人所作,也为中国人讲授,以中国当时现实社会为背景演绎佛教故事、佛教理论,以及中国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可以说,“变文”就是民间的传教资料,俗讲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3.弘法僧住锡敦煌、清规出现、供养人地位的提高与佛教信仰方式的中国化

(1)敦煌是弘法僧人的必经之地。汉至唐,敦煌吐鲁番一带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最西线,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界点。因此,东来弘法的西域僧人和西行求法的汉地僧多要经过、甚至滞留敦煌,敦煌由此逐渐成为成佛教圣地、译经中心。有籍可查的第一个出家并且西行求法的汉人朱士行,就是从雍州出发经过敦煌到今新疆和田,并且派弟子带回第一部由汉人取回的真经。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从龟兹到凉州时,曾经滞留敦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返回时路过敦煌。此外,还有不少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者。例如:西晋高僧竺法护世居敦煌,被称为“敦煌菩萨”。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禅。前秦建元二年(374年),乐傅和尚在鸣沙山开窟造像,正式拉开了“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的营造序幕。

(2)清规是敦煌僧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印度,对佛弟子行为具有指导或者约束力的是“戒律”。敦煌文书中则发现了不少清规,有规矩、律式、格令等称谓。这些清规既有涉及寺院僧官、大众日常管理的,也有涉及寺院土地、资产经营的。既有寺院制定的,也有官府下达的。应该说,无论“戒律”,还是清规,僧人都必须严格持守。但清规与“戒律”毕竟不同,清规的内容不见于“戒律”。戒律是印度佛教制定的戒律,敦煌僧人既执行戒律又执行清规。从敦煌僧人的日常生活来看,对僧人影响更直接的是清规。可以说,这些清规就是“律”中国化的表现。

(3)供养人地位的提高。莫高窟壁画中,有9000余身供养人画像,绘制时代从北凉至清代。人物既有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既有汉族人物,也有匈奴、鲜卑、吐蕃、回鹘、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从北凉至隋代,供养人像高不盈尺,大多绘在四壁下部、龛沿、龛

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边角位置,与佛、菩萨画像间有明显的界栏,显示出供养人画像在洞窟题材内容中地位之低下。唐代,供养人画像升到甬道两壁等比较显要的位置,高度与真人差不多。从人与佛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北朝至隋代仅仅是虔诚和恭敬,那么唐代以后则是有所祈求和仰赖。实质上,这种变化是佛教信仰功利性不断增强的表现。绘于晚唐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慕容氏出行图”等场面宏大,画面或庄严肃穆、威武雄风,或煌赫豪富、气派轻松欢快,完全是一幅展示历史场景的画卷,甚至显示出洞窟几成“家庙”的趋势。

4.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的形成与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

(1)寺院经济的发展。印度佛教规定,僧人每日托钵乞食,不事生产。但到了中国,僧人则垦地、种田,寺院经济发达。在唐代,敦煌三窟十七寺一百余家兰若几乎都有产业。寺院不但拥有土地,甚至拥有依附农民,如寺户、梁户、常住百姓、园子等。同样,僧人也有私人的奴婢。寺院、僧人有田园、碾碓、园圃、林场、牧场等资产,从事放贷、畜牧、营运等产业。与此相适应,寺院配置有分工明确、人员齐全的管理队伍:直岁(会计)、都头(仓库管理)、都师(仓库管理)、僚司(布施管理)等。如此看来,寺院就是一个产业雄厚、追求利润的地主庄园。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佛教宗派文献的流布。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先后出现了八个宗派。除了寺院经济为宗派出现奠定基础外,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及佛教思想家们对于佛法的分类判摄,也是主要原因。在敦煌,各宗各派的踪迹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比如:三论宗的始祖鸠摩罗什、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都曾经留敦煌,密宗文献、禅宗文献、律宗文献、净土宗图像在莫高窟石窟及藏经洞文书中存量很大,有些已经结集出版。第61窟因绘有华严宗、天台宗尊奉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图,又被称为“文殊堂”。一般认为,禅宗是纯粹的中国式佛教,五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中心。禅宗的诞生、中国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表现。

这两点,在敦煌都有十分充足的表现。兼容禅宗南宗学说的摩訶衍曾经从敦煌出发去拉萨传

法,推动了藏区禅宗信仰的发展。莫高窟第 61 窟《五台山图》全图长 13.4 米、高 3.4 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

5.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佛教经过中亚、新疆进入甘肃,在敦煌开始与中原文化交汇,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也全面开始。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

书昭示,经过河西走廊的不断融合,在进入中原之前,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表面上看,中国的佛学是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的佛学。实际上,中国的佛学是完全融入中土文化的佛教思想观念,是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商性”相通:汉唐间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贸易

高 荣

丝绸之路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因所经地区不同,又有绿洲道、草原道、西南道和海洋道等。但是,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北非的经贸文化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地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交汇地带的河西走廊,不仅对于古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也是中原王朝对外开放和涉外管理的重要窗口。

一、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 商贸往来繁盛之区

早在先秦时期,由中原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丝绸之路就已出现。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中国的丝绸已见于中亚、南亚和欧洲等地,而殷墟妇好墓中的玉器则主要来自新疆和田,“玉门”之名即源于其地为输入美玉的门户。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不仅汉朝“使者相望于道”,而且西域各国使者也“更来更去”络绎不绝。河西汉简中有很多西域使者商人往来各地的记载,所涉及的国家有楼兰(鄯善)、于阗、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 30 多个,其中还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祭越、折垣等国名。据永光五年(前 39 年)《康居王使者册》记载,“数为王奉献囊佗”的康居王使者杨佰刀等人每次从敦煌入关,都会得到沿途各县的饮食供应。这些西域各国的使团,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商业贸易

之实。因此规模很大,动辄数百人。汉简记载的一批从内地途经酒泉禄福(今酒泉市肃州区)、敦煌渊泉(在今瓜州县境内)回国的西域使团,自于阗王以下竟有 1074 人。由于过往人员众多,沿途食宿等均由当地郡县供应,以致河西各地疲于应付。汉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就指出,敦煌、酒泉等郡“给使者往来人马驴囊驼食,皆苦之”。到东汉时,更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中原动荡不安,但河西则是相对“独安”之地,西域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国仍然“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就有很多与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贸易的记载,而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则表明,即使在“永嘉之乱”前后,在河西走廊敦煌、酒泉以至姑臧(武威)、金城等地,仍有数以百计的粟特商人活动,他们对当地粮食等各种物资的市场行情非常了解。隋唐时期,通往西域的三条路线“总凑敦煌”,河西各地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隋朝大力经营丝绸之路,西域胡商“多至张掖交市”,其中大业五年(609 年)共有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使者聚集张掖进行互市贸易。唐代更有大批西域胡商云集河西,以致“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贞观初年玄奘西行至瓜州,胡人石槃陀为其介绍了一位往来伊吾 30 多次、非常熟悉沿线交通的胡翁做向导,而此胡翁则以一匹曾十多次往返伊吾的老马相赠,并最终经莫贺延碛到达伊吾。阿斯塔那 509 号墓出土的石染典请过所文书,分别记载了开元二十年(732 年)三月和次年正月西州商人石染典两次到瓜、沙等地贸易的情况,敦

同的基础上,各族群众熔为一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隋唐风貌。与此类似,伊斯兰教东传与突厥、回鹘西迁相结合,造成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同步发展的结果,突厥—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亚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到南俄草原、囊括众多民族的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浸润,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明的整合与共享成为可能,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从另一侧面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居于中心节点地位,它虽然不是具备强大驱动能力的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却留下了最多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显示古代的敦煌具有全方位的接纳条件和辐射能力,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第一站。敦煌藏经洞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斯坦因称之为“多语种图书馆”。文书与壁画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是包含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而这正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突出特征。即使在蒙古时代,敦煌也在“欧亚大贸易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敦煌仍是不可替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枢,除了莫高窟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文书外,《经世大典·站赤》《马可波罗游记》等传世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敦煌文书不仅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做生

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商队的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即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宗教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受众的信仰,离不开民族及其语言这一载体。敦煌文书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族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显示了他们与敦煌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对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但在今日中国已难觅踪影,只能在敦煌文书中看到其昔日盛景。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传播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也对民族的交融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文书显示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异常包容,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明复兴与中国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高荣,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史研究。

杨林坤,兰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北史研究。

胡小鹏,《西北师大学报》编审,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 杨莲霞】